

浪 涛 声 中

贺
巾



洛江日夜奔流，滔滔的浪声，似乎在诉说渔民的悲愤：

人杀了，
屋烧了，
灭不掉的是
渔人的勇气和希望
废墟中，我们又把
家园重建！

（一）

六〇年代初，我们夫妇接受了苏门答腊答眼亚庇(Bagansi-Api2)（以下简称 B 港）一间华文中小学的聘请，前往任教，途经廖省鲁拔岛(Pulau Rupat)，客船靠岸，我们曾漫步在一片洁白的沙滩上，向东辽望马六甲模糊的远影。友人告诉我说：“这是当年郁达夫逃亡过的地方。”在二战结束时，这位爱国作家，却遭到日寇杀害了。眼前，国内政局动荡，此去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？

青年人，总要勇于接受时代的挑战，我们坦然前往。

前面是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海……

船在前往目的地途中，遇到美国万吨级油槽船从杜迈(Dumai)港满载而出。它所掀起的大浪，把我们的小船颠簸得如一叶

扁舟，有的人在埋怨，有的人用印尼语骂道：“Merampas!（掠夺）”

船行了数小时，终于抵达 B 港。我们因晕船，那时也顾不上瞻仰洛江的丰采，赶著上岸休息了。

（二）

B 港在廖省北端，位于苏门答腊岛中部的东岸，地处洛江河口，浊水滚滚的洛江，自中部高原奔腾而下，向东北注入马六甲海峡；河口辽阔，岸边都是泥滩，长满红树林和水柳，与鲁拔岛海岸的遍地白沙，恰好相反。对海产有研究的人却说：“正是这样的河口的水温最适合鱼虾生长。”

B 港是华人开辟的渔场，印尼人称为“渔人之乡”。当时人口已有四、五万人，主要是华族闽南人。

相传于清朝年间，一家洪姓渔民，在泰南某渔村，因与当地青年发生了婚姻纠纷，加上种族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，矛盾极为尖锐，随时可能爆发一场血腥冲突。为了避免这一场灾难，洪姓族长毅然决定全村彻夜搬迁，分乘两艘渔船，各安有王爷神位，一向北，一向南，匆匆投奔怒海；向北那艘，后来不知所终；向南的，船上共有 18 人，在马六甲海峡夜航，发现远处有火光（萤火），于是靠岸停泊，时为农历五月十六。由于当地海产丰富（有人形容说，用帽子往海里一捞就有鱼），于是以此为家。先辈们荜路蓝缕，终于把它开辟为渔港和商埠，一度为世界第二大渔场（仅次于挪威）。他们认为这是王爷指引的吉祥之地，以后每年此日大事祭拜，热闹景况甚于过年。但也有另一种传说：据考古学家推测，B 港人很可能是明惠帝南逃的随从的后代。农历五月十六的祭祖仪式，最后有烧纸船一节，意在灭迹，以免被追踪；此外，也在附近其他小岛挖出明代的陶瓷器作为证明——不知怎的，我宁愿想念它是第一种传说。

B 港华人住户，大多有安王爷神位和一面令旗；门前摆有一两个高过人头的大水桶，是盛雨水用的，因为这里既没有自来水，挖出的井水也是咸的，所以食用的水只能靠天。B 港面海，背后与苏岛腹地

之间，隔著一段两、三米深的沼泽地，原先可能是个小岛，由于泥浆的冲积，渐渐连接起来。以往荷兰殖民主义者曾打算建铁路或公路，都以失败告终。（现已有公路通省府北干巴鲁）人们笑道：“荷兰人只会在欧洲造陆地，却不会在亚洲造路！”那时 B 港市内没有汽车，也没有柏油马路，街道是用红砖砌成的。这里出门都以船代步，船的航行都要靠海潮；潮水一涨定，立即开航，否则，几十分钟后，潮水一退，船就有可能搁浅。因而，当地人流行一句话：“行船不等父！”可见船长的权威。

（三）

B 港一带的渔民，多有硕大的体格，通常穿着用红树汁染色的唐装短裤，赤着膊，露出黝黑的皮肤，显出大老粗的模样，讲话声音洪亮，常有“三字经”的口头禅；加上生活设施的简陋，因此有位印尼官员认为 B 港人迷信、落后，就对新闻记者说：“谁要看十八世纪的社会，就到这里来。”可是这位官员忘记了，恰恰是这些“十八世纪人”，以生命同海浪博斗，开创了这座世界著名的渔场，每年为政府赚取了巨额外汇。

殖民主义者说：粗野的 B 港人，在日治时期，曾经到公海行劫，是海盗。但当地人告诉我说：“所谓渔民当海盗，是污蔑。日治时期，渔民们扬起帆，暗中运送海产到泰国换取米粮和商品，回来时满载而归，不知情的人便说是拦截得来的。事实上，B 港人与海盗是势不两立的。二战结束后，有一支马六甲海峡的海盗约 20 人，全副武装，自称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，企图占据这里作为立足点，但他们的真面目不久就暴露无遗，因为他们之中竟有抽鸦片和嫖妓的，而且他们根本不懂得抗日军的政策是什么。当地渔民的子弟，有许多曾到星马读书和工作的，熟悉马来亚的情况，加上有些渔民是从中国来的退伍军人，有军事常识，于是引诱他们深入腹地，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，最终把他们全部消灭。

殖民主义者又说：B 港的渔民是很野蛮的，他们把敌对者装进袋子，压上大石

块，沉进洛江，毁尸灭迹。熟悉这里自然环境的人就知道，这里到处是烂泥滩，要去哪里找大石块？其实，B 港人只是外表粗鲁，心地是很善良的。他们的渔寮每天都熬着一大锅粥，过往的人，不分民族，谁都可以享用，不收分文，理由是这里并没有菜馆。这足见他们是热情好客的。

（四）

我们任教的 D 校，是在 B 港一片平地上。同事们告诉我说：十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个码头，一千多吨的轮船可以靠岸。现在还遗留一截生锈的阶梯。洛江每天都把上游的泥浆带到下游；大海的潮汐，又把泥浆推涌到岸边，日复一日，就把海滩变为陆地了。可是迷信的人说，掉进海里死去的人多了，陆地自然要隆起。这个大河口，十多年就要浮现一个小岛，附近的渔村，四角芭(Pulau Halang)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但有时海潮也会把一座小岛慢慢腐蚀，以致完全冲毁，远地来的轮船若是没有导航，常要搁浅。武吉斯人是天生的航海家，到了这里，有时也会迷航。

洛江河水的潮起潮落，时刻都在进行着大自然的搬迁。这大概就是所谓沧海桑田吧？

侨总办的 D 校（中、小学），大门建得如天安门城楼，门前还有两头石狮子，象征着华侨对祖国的热爱。这里也是左派阵地的标志，在这个范围内，时刻都有琅琅的读书声，阵阵的歌声，周末晚上，也有集体舞，一直狂欢到夜间 10 点才散去。假日也有篮球、排球赛，非常热闹。但后来却发生了一场内斗，吵架和怒骂声，取代了琅琅的读书声和阵阵的歌声，实在是令人扼腕！

1964 年，侨总要落实“俭朴过春节”的侨务决定，因处理不当，触发了一场内争，我们夫妇也遭到了池鱼之殃。

那年春节和回历开斋节同日，按照侨务政策，指导华人过年要自谦，不要奢侈。这本意是好的，但 D 校在执行上没有过细，只以一纸命令，就要全体师生落实。其实，好些师生还不太明了，待到春节那天，有几位女教师穿着基本裙上街访友，竟遭到校方一顿责难；别有用心者，甚至

发动初中部学生起哄。受责备的女教师有所辩解，也被认为大逆不道。有的女教师甚至遭到解职处分。她们之中也有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者，校内因而闹到满城风雨。当权派还在壁报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女人臀部，注明“这就是基本裙所要突出的”。初中部个别学生甚至当街辱骂老师，说穿奇装异服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，必须打倒。事实上被令解职的女教师，恰恰就是渔民子女，却成了资产阶级腐化分子？真是莫名其妙！

面对这场风波，我们夫妇认为校方处理不妥，不从积极方面引导师生，反而肆意对有关者进行人身攻击，把事情搞成对抗的了。校方不但不接受我们的意见，反而听信闹事者的谣言，说我的妻子鼓励女学生穿短裙，我听了觉得可笑，回答道：“这很简单，作为老师，只要看她自己穿的裙是长是短，岂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”

原来有一天朝会，有位女学生穿了她的姐姐的旧裙，裙子的边缘断了线，拿来叫我的妻子帮缝补，我的妻子帮补好了，同时对她说：这裙的裙边剪掉，你穿起来还是够长的，可以盖到膝盖。那女学生并没有意见，想不到事情传到别有用心者那里，就制造出这样的谣言。

我们向校方提的意见，不被接受也就算了，反而被当权者指为妥协分子、投降派，于是，我们愤而辞职。当时四角芭 R 小学的董事 H 君正在 B 港，立即把我们聘请了去。当然，要去更偏远的地区工作，日后生活会更艰苦，何况，我们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子。搬家时，有好些学生竟不敢来送行；而那几个起哄的学生，故意在旁讥讽道：“要去高升啰！”

我们踏出了那座天安门城楼的校舍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中国发生了“文革”，我觉得这种极“左”的思潮竟如出一辙。我们似乎是在一场预演的迷你型的“文革”闹剧中扮了受害者！

（五）

搬到四角芭 R 小学，我们住进了当年苏先和校长住过的房间。1959 年（也就是排华的总统十号法令实施那一年）这里发生过一宗血案，苏校长的独生子和几个渔

民，被武装军人乱枪所杀；他的独生子重伤致残，几个渔民当场丧命。我们的房间壁上，三个弹孔还清晰可见。据说，当时凶手还嫁罪渔民，到 B 港报告说渔民要武装谋反，所以遭到机枪镇压；当地社会贤达，包括董事长 H 先生（当时也在 B 港）要求立即彻底调查，以清真相。

政府人员正在犹豫之际，H 君说：“要是你们担心渔民有武器，我愿站在船头带路，万一他们谋反，就先杀了我！”于是，当局只好派员随行。调查结果证明，渔民不但手无寸铁，而且是被活生生打死在劳动场地上，尸体伏倒在鲜鱼堆。当局因此不得不追究凶手，并绳之以法；另一方面也让社会人士公开祭拜，安抚安魂。苏校长的独生子也送到医院治疗，后来举家归国。

住进学校每当想起华人渔民的处境，在夜里听海风呼啸，似有冤魂在泣血！

（六）

四角芭在 B 港附近，乘船一个小时可到。它是洛江河口的一个小岛，岛上都是水上人家，渔寮、住家、校舍都以高脚楼的形式建在泥滩上；屋顶盖亚答叶，街道都是铺木板的，高出泥地三、四米，但年底高潮时，曾经淹到木板上。每天潮水的涨落，浪涛滚滚，同时狂风大作，校舍犹如在风雨飘摇之中，渔民正是利用了洛江口的潮起潮落这种自然动力，在该处手插下树椿，在两条树桩中绑上鱼网，让激流把海产冲进网底。四角芭周围的海面上，尽是密密麻麻的树桩几乎接近公海。当船出海时，常有海鸥紧随其后，或“咿咿”地欢叫，或闪身俯冲，捕捉鱼虾，那渔鹰却是悠哉闲哉，或翱翔高空，或栖身枯树，时刻伺机而动……

每天四次潮水的涨落，渔民要付出巨大的劳力去捕鱼；有的人不堪其劳而瘾上鸦片；有的渔民只选择捕鱼两次。最初，渔民们都是用劳力划双桨的，遇到流急浪高，稍不小心，掉进海里，即使是游泳健将，也是凶多吉少的；有的渔民，一家三代，都葬身海里。每逢有人跌进海里，全村就要出动渔船寻尸，船杠上揭起死者的衣服，在哀伤的气氛中默默航行，直到把

尸体捞起——当年 H 董事还只是一名初中生，便也同其他有识之士，在思考着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。他知道，关键在于渔船的动力，若能以机器取代人力，那么，安全上就有保障些。于是，他不惜投下巨资，远到棉兰、雅加达寻找。先是采用舷外摩多，用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它常出故障，又改换装在船舱内的柴油机，试用以后，觉得相当理想，既容易操作，又容易护理，便介绍给渔民广为采用。从此，四角芭人的生活就获得明显的改善。于是像 H 董事这样的青年，便自然地成为社会领袖了。（当然，捕鱼的方式还有其他许多种，包括了六十年代后的拖网渔船。）

四角色人，每逢低潮（每半个月一次），便有一次“歇流”，休息一两天。他们喜欢三、五成群地围在地板上聚饮，通常是一个大碗盛白酒，大夥一人一口轮着喝，一边高谈阔论；酒后也有醉态出丑的。渔民们相当大方，渔船捕回来的鱼虾，邻居都可以拿去吃，事先不用问，事后也不用谢。渔民子女，非常喜欢文娱、体育活动，经常到学校来唱歌跳舞，每天下午，把晒鱼场打扫干净，就在那里打篮球或排球，欢笑场和呼喝声随即扬起，同浪涛比欢乐！

（七）

在四角芭教书，倒是让学生为我们上了一个“因材施教”的课。有一位叫洪阿刚的学生，七、八岁，二年级，功课极差，又好动，又顽皮，常捉弄同学，被班主任处罚，有时甚至鞭打手心，那位女教师气红了脸，他却铁青着脸忍痛。女教师还连声责骂道：“又坏又笨！”有时弄得他无地自容。那一刻，他显得有几分自卑。但观察他在玩游戏时，却是很机灵的，唱歌，跳舞也还跟得上。有一次我们几位教师要出去家访，原来打算沿着木板桥慢慢走去，洪阿刚竟自告奋勇，邀请我们乘坐他的渔船去。

我们四下看看，并没有渔民在场，便问道：“谁驾船呢？”

“我！”他自豪地回答，立刻就要扶教师下船。

等我们都下去，并坐定了，他兴奋地

发动了机器，又迅速地跑去掌舵，果然把我们送到各家去。每当要靠栈桥时，他还能像大人一样放慢速度，轻轻靠拢；我简直惊讶，他这么小小年纪，几时学会的？抬头一看，这位小“大公”（舵手），满怀高兴，满脸笑容。

我想：这样能劳动的孩子，也一定能把书读好。当我们几位教师统一了认识，对这位顽皮的学生采取多鼓励，耐心教导后，果然他们功课渐渐跟得上了。当然，有时不免又要捣乱一下，让教师生气，总之，事情也不会一帆风顺的。

不过，从他身上，我们似乎看到了渔民下一代的希望！

（八）

1965 年“九三〇”事件后，华校被封闭，B 港的 D 中、小学，在那天安门城楼内，再也没有琅琅的读书声和阵阵的歌声，里面日夜静寂，渐渐长满了杂草。

四角色的 R 小学，虽然是国民学校但是由于它是华人创办的。在反共排华叫器声中，也不免感到唇亡齿寒。

平日政府人员已有多种监督措施，也曾突击检查，都顺利过关。

1967 年深夜一场火灾，把渔村夷为平地。当时我去参加救火，直到天亮，大火扑灭了，我们的家、校舍已荡然无存，变成烂泥滩上的一堆灰烬。当时妻子带着孩子，被渔民救离现场。事后，有人怀疑那场火灾是“人为”的，因为有人发现了难以解释的迹象，可是，在那苦难的岁月里，向谁去投诉？四角色的渔民悲愤地说：

“人杀了，

屋烧了，

灭不掉的是

渔民的勇气和希望。

废墟中，我们又把家园重建！”

小学也重建了，校舍竣工以后，我们也离开该岛，另走他乡。可是无论走到哪里，耳际总有洛江的浪涛声，在诉说渔人的心曲！

如果怒吼的黄河，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那么，滔滔的洛江便是 B 港渔民的写照了。